

第二章、理論研究與探討

近幾年「後殖民批評」（或稱「後殖民理論」）無疑是當前文化研究領域的一門顯學。後殖民批評因為具有跨越不同科際的特色，以及接合理論和實踐面向的動態張力，使得後殖民批評成為文化研究領域，最具顛覆性的評論／批判力量。當然，這並非單純從學院自生的學術氣候，乃是世界局勢、社會變動與文化思潮相互激盪的產物（張京媛編，1995：9；羅永生著，陳清僑編，1997：11）。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全球格局起了劇烈的變革。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文化地景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摩天大樓、商廈、公寓塔樓、高速公路、地下鐵路等，已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這讓許多城市景觀看上去像「西方城市」一樣，充滿了現代的舒適感，方便的設施和消費機會。這些現代性物質與文化，往往讓我們在不自覺的狀況下，容易被這些繁榮與進步的象徵所征服、傾倒或迷戀。對此，我們必須謹慎的抱持懷疑以及批評的態度。

在上海的後殖民城市發展經驗裡，上海並非循序著西方都市化的漸進發展模式。上海的城市空間中充滿著傳統與現代、殖民與後殖民的矛盾與衝突。九〇年代以後，這座城市更在短短幾年間，以驚人的發展速度，建造起一棟又一棟的摩天大樓，一時間，城市天際線大大不同。上海，一躍成了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然而，光鮮亮麗的大都會外表下卻也隱藏著的舊時的文化容顏。倘若漫步上海街頭，穿梭日常生活的里弄、街坊，一一拆解像是名牌汽車、地鐵、摩天高樓的各式符碼，會發現與來來往往的腳踏車、弄堂、簡陋的樓房是與新的上海容貌相互參雜並存的。娛樂消費空間如電影院是明亮、寬敞、現代－新式影城，與暗沉、破敗、傳統－老舊戲院在城市空間中形成高度反差、對比。然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往往試圖在空間上塑造一個中心點－「西方城市」模式，藉此座標進行對位、思考－「東方城市」。這讓人類的日常生活空間與都市經驗普遍被「西方」宰制下重新被編碼，使之成習、視為理所當然。類似此般以西方中心的思維論述，仍持續不斷的在新的全球環境下延衍再生。對此後殖民理論／策略的這股文化批判力量，正可提供我們極具批判性思維，打破殖民話語構成的主導意向的動力。因此，在進入上海電影院分析之前，基於對後殖民主義較為複雜的理解，本文有必要對後殖民主義及其相關概念作一整體釐清。

一、後殖民主義的起源與發展

（一）後殖民的意義與起源

1. 後殖民的意義

後殖民主義之前，對於殖民主義的批判早已有很長的歷史。從 16 世紀帝國主義興起以來，全球有五分之四的人口曾受到殖民經驗的影響¹。歷經 16~17 世紀帝國主義時期、19 世紀末的解放獨立運動，直到二十世紀第二次大戰逐漸脫離殖民紛紛獨立，才進入後殖民時期，時值全球化盛行、現代化後殖民城市興起，曾經被殖民的國家及地區，依舊在物質和精神上無法完全擺脫殖民者的遺存。不論自願與否，從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文化、語言、種族、宗教，到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殖民經驗均被深深被植基，沒有因為殖民地已經獨立而消失退去，反而因為殖民地獨立後，這些議題更凸顯出從西方殖民文化傳播到被殖民化文中，雙方實際在認知和接受上普遍有所落差，特別是在後殖民論述者進一步以回首、思索、反省，以瞭解或釐清自身如何被殖民經驗所宰制、建構，以擺脫白人邏輯，跳脫自陷在殖民的後遺症，成為後殖民的重要課題。（廖炳惠，1994：13-17）。

有關「後殖民」一詞的意義，出現至今爭論不休，諸如「後殖民」究竟起於何時？後殖民的「後」，是指「之後」（after）？是否涉及「之前」（before）？究竟是指「晚期」（late）？還是指「新」（new）？所涵蓋界定的意義與範圍又在哪？都因「後殖民」一辭在語意和使用上的不確定性，且後殖民批評家對此概念的分歧解釋，自今未決。因此，本文在一開始試圖嘗試性歸納、整理其定義，以有助本文之後論述的思考與使用。

究字面上意義，後殖民（postcolonialism）一辭是複雜難解的，它包含著複雜的歷史時序與意識形態的意義在裡面。倫巴（Ania Loomba，1998：7）認為，後殖民的「post」隱含著殖民「後果」的複雜性：在歷史時序上，「post」意味著後續；就意識形態而言，「post」則意味著一種替換。後殖民學者張京媛也指出，後殖民有兩種含義：一是指時間上的完結，即從前的殖民控制已經結束；另一個涵義是意義的取代，即殖民主義已經被取代，不再存在。然而，張京媛對第二個意義是抱持存疑的。因為如果認為殖民主義是維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

¹ 從 1815 年到 1914 年的一世紀內，歐洲直接控制的地球表面積從 35%，暴增到 85%（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57）。

話，那麼我們所處的時代依舊沒有超越殖民主義。「殖民化」表現為帝國主義對於「不發達的」國家在經濟上持續進行壟斷、在社會和文化上進行西化的滲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習俗，從而弱化和瓦解當地居民的民族意識（張京媛編，1995：10）。後殖民主義論者史碧娃克則擺脫歷史時間序列本質上的理解，她認為後殖民主義的「後」（post）不一定指“之後”的觀點，「後」往往是因為故有的殖民影響，產生出兩種社會文化的接觸，因而不一定是指陳“之後”，歷史時序上的意思（Spivak Gayatri C.，1993）。

因此，對於殖民之「後」的原殖民地國家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在術語的使用及理解，必須正視兩種術語的不同認識，其直接體現在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與「post-colonialism」一詞。前者是表示後殖民國家獨立後，並不意味著後殖民主義已經終結。其突顯著殖民後果的「持續性」概念，直指這後果是延續性、持久性及反殖民鬥爭是艱難、不易。後者加了「-」則表示與殖民主義有本質的斷裂及區別，也就是與前期的殖民主義在性質上有所不同（陶東風，2000；宋國誠，2003）。由此可知，後殖民不是一個靜態、單向的概念，它包往往含著歷史與非歷史的雙向、有機的動態形式存在，我們不能僅對字面上意義來作使用，更要一併對不同國家人們與特定族群、團體的適用性作小心的界定及理解。

究內涵上廣義而言，後殖民主義是指歐美西方國家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的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對於落後的民族和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的一種侵略政策，因此在理論上常常視後殖民主義也是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一般認為，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以西方先進國家及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而非西方的落後國家或地區的民族文化，則往往被貶稱為邊緣或愚昧的文化。這個概念，正突顯所謂非西方、非中心、邊緣落後的文化，當代仍持續被不斷淪為他者化，西方文化霸權逐漸代替了西方以往對第三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與西方文化霸權的對抗就成了後殖民時期長期政治衝突的主要內容（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同時，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因素使得近代西歐得以佔有優勢，西方文化變得更容易擴散開來，資本主義的轉換使得歐洲文化獲得更大的擴充空間，帝國殖民化與文化含混更加大了西方世界在商業及文化等形式的全面擴展（楊雪冬，2003：5-6）。這使得後殖民在著重文化與精神層面影響上，也不得不注意全球性的經濟產品與經濟消費行為，其實正是形成當代殖民無所不在的新型帝國控制。因此，後殖民主義對文化再現與想像的考量，也適時的將全球化經濟利益問題納入探討核心，以避免無法充分指涉文化滲透及帝國權力宰制緊密相關的結構。

2. 後殖民的起源

在歷史時序上的順承關係上，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各自又代表及蘊含著何種意義呢？

從殖民主義時期說起，「殖民主義」(colonialism)自16世紀迄今已有四百年的歷史。一般而言，殖民主義是西方帝國主義對非西方國家最早進行軍事和殖民的時期。伴隨著早期全球化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對弱國或地區進行壓迫、宰制、奴役與剝削的政策；透過向外傾入移民、原料掠奪、奴役販賣、資本輸出、商品傾銷等行徑進行侵略政策。致使殖民與被殖民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利益不平等的經濟交換關係。同時，在殖民遭遇的過程中，不同地區雖有著不同的過程，但是均依賴著一種以帝國宰制的經濟和社會依附形式與控制關係 (Ania Loomba, 1998: 1-7)。²

在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巴巴 (Homi Bhabha) 看來，殖民遭遇的過程其實蘊含著更複雜的「心理操作」策略。巴巴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一書中指出，“殖民論述必須依賴一種對「他者性」(otherness) 的意識形態建構的「固定性」(fixity)，這種「固定性」是一種作為「文化／歷史／種族」的差異符號內涵在殖民論述之中的，並且利用一種「定型化」(stereotype) 的操作策略進行對被殖民者的複製。因此，殖民主體的建構以及殖民權力的施展，就是運用這種組合了各種「等級差異」所形成的知識與意識形態而得以實現”(Bhabha, 1994: 66-67)。這使得近世紀以來，殖民者以「文明」的名義建立在殖民地社會是如此堅固牢靠，在空間與時間上均得以站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位置。

冷戰之後，許多原先被殖民國家紛紛獨立之後，以新興國家取得國家的主權獨立，在鬆散的政治體制及經濟落後的狀態下，形成了所謂「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經濟上依然無法擺脫對原宗主國的依賴。與此同時，因著通訊技術的革命，加速了全球化各方面的發展，西方在掌握技術與金融等方面優勢下，有助於對第三世界進行非領地化的殖民，遂而進入了「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 階段。新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下的延續，同時也指涉著對前殖民地各種控制形式 (Ashcroft, Bill eds, 2000: 162-163)。因此，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兩者，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西方對殖民地的掠奪，從過去的土地及資源掠奪，轉變為對經濟、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控制。同時，此一現象隨著美國好萊塢文化工業與商品大量向第三世界傾銷，情況更為加劇明顯 (宋國誠, 2003: 3)。原來的殖民地歷史

² 「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雖有區別，但仍有許多面向有重合之處。大體而言，殖民主義特別強調種族 (race) 的區分，也就是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形成一種主奴之間的關係。具體表現在如膚色、階級、種族上面，都有一種權力的關係，以排除他者，對與西方相對的劣等人種形成性別與階級的幻想和刻板印象 (廖炳惠, 2003: 47)。

已被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新殖民主義上（Ashcroft, Bill eds，2000：162-163）。因此，針對新舊殖民經驗如何加以界定自身的本土文化，強調傳統文化的契機和不同之處，成了重要且迫切課題。第一位提出新殖民主義的學者，同時也是泛非洲主義倡導人之一的努瑪（Nkrumah, Kwame）即指出，新殖民主義往往透過市場和經濟力量，以及全球化的組織機構，從教育、文化、媒體到技術性的輸入，對早期的殖民地地形構成更加全面及更顯無形的侵略（廖炳惠，2003：176）。這種經濟全球化產生的跨國貿易、資訊互動、文化入侵等國際間來往的頻繁，造成了諸如選擇、抗拒、整合、排斥等問題，從而進入新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的交接時期（陶東風，2000；宋國誠，2003）。

新殖民及後殖民併行（或稱後現代情境）下，一股強烈的「認同政治」與「文化尋根」運動，促成了後殖民運動的發展。此間，著名的非洲知識份子、旅居巴黎的心理分析學家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即為先鋒代表人物，他於1952年發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1961年發表《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提出遭受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應去掉心靈與精神上的殖民狀態，而不只是爭取表面的獨立形式，喚起了被殖民者的精神及文化自覺（張京媛，1995：12）。在此情形下，殖民地被迫重新界定本身傳統，對全球與本土的生產模式之間的辨正關係，提出自我和他人再現的文化政治問題，以導論出彼此間所存在的文化差異問題（廖炳惠，1994：17-18）。

70年代末，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1978年），以殖民話語作為研究對象，提出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東方主義」概念，尖銳的批判西方殖民主義以各種文本形式深深影響「東方」並且對受殖民者進行文化與知識的編碼與製造（張京媛，1995：13）。隨著愛德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逐漸備受重視，使得「新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有了更明顯的分壘³。雖然新殖民及後殖民都在冷戰之後併行發生，對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的不平等，提出強烈的民族自覺及尋根運動。然而「後殖民主義」更關注於傳統殖民統治如何通過文化生產和解釋、通過文學敘事、透過媒體科技、符號系統以及受過西方英美國家教育的高級知識份子的文化代理功能，延續或持續這種有形和無形的帝國主義文化入侵和滲透，因此，「後殖民主義」又稱「文化殖民主義」（陶東風，2000；宋國誠，2003）。

總歸來說，「殖民主義」一直要到1947年殖民地紛紛獨立，學者提出「脫離殖民」與「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觀念，才逐漸淡出歷史舞台，而朝向「後

³ 王寧學者則認為，後殖民主義繼承並強化了以往舊殖民體系的一種「新殖民主義」之內部批判。這是因為挑起後殖民主義討論的批評家多非來自於西方的「前」殖民國家，而是一批有著第三世界但在第一世界主流的學術圈身處高為的精英知識份子，他們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後殖民批評仍然持有一種，以第一世界內部的话语作主導的爭議存在，因而不免帶有新殖民主義的特徵，這也是後殖民理論難以擺脫的雙重性（王寧：2003：48-49）。

殖民研究」的階段，重新論及被殖民的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如何透過後殖民主義的關注，重生歷史記憶及語言（廖炳惠，2003：47）。一般認為，「後殖民主義」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時代和全球非殖民化背景下，作為一種新的文化趨勢和知識典範而興起的（宋國誠，2000：5）⁴。然而，若僅是歷史變遷展衍而使「後殖民主義」的起源有一個確定年代的劃分，這對後殖民主義是危險的，因為「文化」本身即有「分裂性」和「再生性」，是超越編年序列上時代的意義，這無疑宣告後殖民主義是無意義的。因此本文認為，我們在看待後殖民主義的起源，不應僅是放在一個歷史編年序列上的意義，後殖民主義同時也應是一個政治運動、一門跨學科和涉及廣泛議題的論述活動、一場知識份子的活動。它主要旨在打破文本與語境之間從前的固有邊界，以顯示被征服人民的再現方式和（新－）殖民權力物質實踐之間的連續性。

（二）後殖民批評與文化策略

為了便於以後殖民批評作為文化策略，論述上海殖民城市的文化語境及其電影院的討論。本章節首先整理分析薩伊德筆下的「東方主義」的重要觀點，其次則討論巴巴的「戲擬」與「混雜」於文化（再）生產的問題，最終綜合歸結後殖民文化策略可能遭遇的困境。

由於，後殖民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的興起，可以上溯到法農，而後轉進到薩依德、史碧克娃（Spivak）和巴巴等西方理論家對殖民地寫作／話語的研究有關，近幾年相關後殖民的論述、文章也已在在各個領域探討開展出來，批評的策略也顯得多樣。本文礙於篇幅，無法一一加以闡明各批評家論點。因此，僅究於後運用到的重要後殖民主義觀點與辯論，加以提出說明。

1. 東方主義及其批評

薩依德在 1978 年提出重量級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普遍認為，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代表著後殖民批評的第一個階段（陶東風，2000：75）。同時，薩依德將理論引出學院並帶入世界，《東方主義》具有特定時代的精神意義展現。《東方主義》主要的貢獻，乃是對於打破西方帝國都會的迷思及發揮文化批評的作用，對歐洲中心主義建構東方他者的帝國主義心態進行猛烈的批評，並率先將後殖民批評話語推向美國文化政治批評的論壇（Spivak, Gayatri C.，

⁴ 有關後殖民何時興起？也有諸多爭議。如：中國大陸學者王寧、王岳川等認為後殖民主義在 19 世紀末業就已萌芽，到了 1947 年印度獨立後才發展成一種新的理論及典範意識，而薩依德的《東方主義》（1978）出版則可視為一個明顯的標誌（王寧：2002：36；王岳川：1999：10）。

1993)。

長久以來後殖民理論持續關注的焦點是全球化以來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理論形成的基礎主要建立與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揭示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學術思考；另一方面則是反殖民主義的書寫及創作，代表人物如：法農(Franz Fanon)。然而，後殖民理論真正引起西方學界關注卻是《東方主義》(1978)問世之後才發生。後殖民主義學者認為：「東方主義對於殖民話語的研究灌溉了一個園地，在這片園地裡，邊緣的東西變得可以言說、被言說或為之而言說。」(Spivak, Gayatri C, 1993: 56)薩伊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觸及到當今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衝突中的諸多問題，儼然成為討論殖民時期和殖民以後的全球狀態關鍵字⁵。然而，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主要論點又是什麼呢？

第一、「東方主義」是一個博學的領域，更是一套龐大的有機體，不斷增殖繁衍影響著我們。

英文”Orientalism”一詞，一般被翻譯為「東方民族的特徵、風格和風俗」，或是「東方學」。根據《牛津英文詞典》的記載，「東方主義」這個詞是1769年首次被霍斯沃特(Holdsworth)評論詩人荷馬時所使用的。”Orientalism”一詞是研究東方各國的社會歷史、語言文學以及別的物質、精神文化等學科的總稱。東方學產生自16~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對外展開擴張時間，在18~19世紀，因為來自東方新的文本，如：梵文、波斯的沃教經典、阿拉伯文等被西方發現、翻譯，使得東方學發展出了埃及學、亞述學、漢學等學科，使得”Orientalism”一詞被西方創造出來(Said著，王淑燕等譯，1999: 59-71；張京媛，1995: 35)。雖然薩伊德同樣是用”Orientalism”一詞，但他的定義與範圍，比起過往的「東方學」涵義要廣泛許多。薩伊德指稱「東方主義是一套形塑思想的條件限制，而非一個正式的學說。」(Said著，王淑燕等譯，1999: 58)東方主義不僅包括西方對東方在學術上特別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觀世界、政治、社會生活、文學作品中對東方所持根深柢固的偏見。因此，東方主義的「主義」二字，適足以分辨和其他學門的不同，同時”Orientalism”一詞被譯為「東方主義」更為適當(Said著，王淑燕等譯，1999: 70；張京媛，1995: 36)。

由此可見，東方主義的範圍與意義的複雜性，像是一套龐大的有機體，不斷增殖繁衍一般的文化，影響著我們。西方持續透過語言學、歷史學、人文學科、藝術創作將東方客體化；以父權主義有色的性別眼光來想像東方，將東方視為一個肉感的女體或是愚蠢的來看待，這個過程經過長久不斷的學科機制來擴充自身主體性，並且以典範自我驗證，進而強化了西方對東方世界的建構(廖炳惠，

⁵ 《東方主義》(1978)一書出版之後，影響所極不僅限於文學與文化研究界起了典範變化，即使歷史、人類學、藝術與科學史領域，也興起所謂的「後東方」及比較社會和文化研究(廖炳惠，2003: 9)。

2003：184）。

第二、西方人創造「東／西」二元區分方式，而且西方永遠優於東方，西方更在真實與想像的範圍掌控著東方。

東方主義基本上依循著薩伊德對東方主義的基本假設：「西方優於東方」的二元區隔模式來進行論述邏輯的推展。薩伊德在〈認識東方〉一章中提到很多形容詞可以形容這種優劣關係，極為典型的如巴佛與克羅莫形容東方為：「非理性的、墮落的、童稚的、不同的」；以之相對於西方的「理性的、美德的、成熟的、正常的」，無處不存在且看似井然有序的存在這世界（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55-56）。這套由西方人創造的「東／西」二元區分方式，在長久不斷影響之下，鞏固了「東方」作為一種西方知識的集合體，進而西方在真實與想像的範圍均掌控著東方；更處處在「替東方（她）說、替（她）再現」；同時，西方更左右著東方，而不是東方影響西方（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

第三、「東方主義」是一種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的話語系統。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緒論〉中開宗明義、毫不諱言的指出「東方」（The Orient）一辭，就是歐洲的一項發明，東方被作為西方相對照的對象，它不僅止於想像性層次，更透過「論述模式」塑造了東方的思想風格（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1-3）。在各殖民階層、制度、意義、學術均可見到它的蹤跡，深深影響著這世界。薩伊德認為，「自古典時期以來，西方與東方都是人製造出來，雖說東方自身有其歷史、思維、想像、詞彙和傳統，然而也就是這一歷史與傳統使其賦予實在性，並出現在西方，且為西方而存。」（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6；60）他為了進一步充分證明他的論點，檢視了十八世紀中葉一直到當代西方對東方在概念與表述上的流變，來強調西方與東方當中反覆出現的二元對立與對比原則使得「西方總是比東方優越」。在東西方之間勢力懸殊的情況下，關於東方的話語交流往往容易成為文化霸權的體現，而「東方主義」則成為了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最有力的話語系統。這套話語系統，東方是牢牢被建固在西方所宰制的知識及權力底下，致使西方長期以來用特定、有色的眼光來觀看東方；甚至對東方的研究不斷進行書寫的知識工程，以壯大自身帝國主體的權力。因此，東方主義的本質背後與帝國主義的曖昧性正是一種對東方世界極為細緻的潛入。

第四、「東方主義」基本上就是西方如何自我「合法化」和「征服她者」有關。

東方主義中不斷指涉與建構的東方，是在西方的知識權力系統中的她者；透過各種觀式東方的方法、被研究、被描繪、被再現出來。使得東方被西方所認知，也被西方所征服。同時，東方主義更是由歷史和物質決定的，東方主義的殖民話語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關係緊密（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3-4；張京媛，1995：37-38；陶東風，2000：81）。這使得非西方被殖民者的反抗運動，將不斷陷入西方輸入各種反政治的形式、理想、價值、口號以及組織方法；反帝反殖的抗爭其實也在不自覺地鞏固著殖民統治與宰制權威。這種反殖的困境，即是當代後殖民評論所關切的最基本的兩難局面（羅永生，1997：14-15）。

由以上陳述可知，薩伊德在《東方主義》闡明了東方研究及其不同再現方式的脈絡背景，東方理論的誤導作用深深影響這世界，因此薩伊德提出了「東方主義」加以駁斥。在當代全球化下的後殖民時期，更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無處不存它的蹤跡與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加以挖掘並對其殖民話語進行嚴厲的批評。雖然，《東方主義》整本的焦點是鎖定在歐美世界（以英、法、美為主）所看見的中東、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並未涉及中國、印度等其他西方殖民勢力，但是卻未減損《東方主義》諸多洞見及精闢見解。對於引申借鏡談論中國乃至於本文論述對象上海本身的後殖民語境，仍有很大的反思空間與啟發作用。

我們非常清楚中國乃至東亞的歷史脈絡不同於伊斯蘭世界，上海更有其獨特的殖民語境，殖民經驗也迥然不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起，不論是近東與遠東都已被納入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勢力，西化與現代化在東方世界是不可避免遭遇到的課題。在西方帝國文化霸權的影響漸深之下，東方傳統文化遭到能否繼續生存及發展的危機。因此，本文認為，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所指陳的中東世界諸多現象，在其他東亞地區也有存在，是需要透過更多形式，加以細緻的探討批評。

2. 東方主義的問題與爭論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的殖民話語分析之所以獨特，乃是因為它是第一本揭開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衣的著作（陶東風，2000：77）。他承襲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論（cultural hegemony）到盧卡奇（Georg Lukacs），再到阿多諾（Theodor Adorno）及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與權力相關研究，對於透過區域研究、二元辨證，以及劃分世界為文明衝突的觀念提出批評（廖炳惠，2003：9）⁶。

⁶ 薩伊德對傅柯的引述諸如：《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知識的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薩伊德將原本傅柯等的後結構主義分析，從原本放置在一種個體化、局部化，體現在日常世界的知識與權力支配關係，擴展放在一個總體理論架構來分析西方帝國殖民／後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的權力支配及知識再生的霸權結構。殖民話語分析當中，讓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所涉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構成要素，巧妙的結合葛蘭西與傅柯的論述，形成了獨特的（後）殖民批評（Moore-Gilbert, Bart 著，彭淮棟譯，2004）。薩伊德自述到「東方主義之所以可以如此持久且強勢，便是由於霸權，或者說就是葛蘭西所謂的文化霸權造成的結果。」（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9）這個研究就是要瞭解西方文化論述的力量；闡明文化支配的龐大結構，和採用此結構在自身與他者身上所導致的危險性與誘惑性（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32）。不過，薩伊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強而有力的論述概念也不無問題存在。

關於薩伊德在《東方主義》所引發爭論的問題，大致上可以歸納整理出四點值得異議之處：第一、《東方主義》裡對傅柯的權力／知識論述的挪用及認知問題；第二、《東方主義》低估了被殖者的反抗能動性；第三、《東方主義》裡二元對立邏輯的侷限性問題；第四、《東方主義》在父權架構底下所忽略到的性別因素。

首先，在《東方主義》通篇之中，薩伊德對傅柯論述的挪用，對於知識及權力之間關係，兩者的看法顯然略有差別。傅柯在其作品中堅信理論與實踐是截然二分的。傅柯認為這是因為表述時難免受到權力所滲透影響，因而無所謂「真實」的表述。反觀薩伊德認為，理論與實踐是需要接軌的，或者我們需要一個「真實」表述的方式來提出批判。這使得薩伊德與傅柯對於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看法有所不同。雖然，傅柯與薩伊德都有共識：將權力與知識視為緊密共構的系統。不過，傅柯預設權力應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擴散現象，而非薩伊德指認權力不外乎來自西方帝國殖民霸權，西方始終支配著東方，權力由上至於下的概念（Moore-Gilbert, Bart 著，彭淮棟譯，2004）。

其次，《東方主義》一書中，一味的將知識與權力看作是西方文化的專利，並且往往將權力放在西方學術結構裡，忽略了被弱勢化、被邊緣化，沉默東方話語的存在性與自有的能動性，引來不少論者批評（廖炳惠，2003：185）。薩伊德自己也承認，《東方主義》忽視或低估了非歐洲世界在物質和話語上對於殖民主義的反抗，他並指陳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西方入侵者，與一個消極被動的非西方本地人的關係。在非西方的本土，總是存在一些積極的對抗形式，而且在絕大數情況下這種對抗最終會勝利（陶東風，2000：95）。

Knowledge）、《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都是薩伊德重要的文本。

再者，《東方主義》以「東／西」二元對立邏輯進行推展是有其侷限性的。如後殖民批評家巴巴（Homi K.Bhabha）看來，「薩伊德在分析東方主義時，不斷暗示著其核心是有一個兩極性或分裂，這是一種歷史與理論的簡化」（Bhabha，1983：200）。因為，殖民與被殖民並不完全是緊張對峙的關係，彼此之間其實是存有既吸引又排拒的矛盾樣態。巴巴指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所建構的權威表述，並非如此完美無缺，是存有空隙與矛盾，此種矛盾性創造了一種被殖民者對殖民地話語深刻的攪擾。這如同：「殖民者在治理殖民地期間，殖民者本身在教化被殖民者的同時，往往投射浮現出自己的影子，影子內涵著在道德上形成罪惡感與優越感的交雜與模糊狀態。此種矛盾的狀態是殖民話語中不受歡迎的特徵。因為，殖民者話語目的是要使被殖民者服膺殖民者所製造生產的種種假設、習俗與價值，亦即“模仿”殖民者，然而結果卻產生出一種矛盾的主體，被殖民總是透過這種矛盾、模糊與搖擺不定的關係，擾亂、戲弄著殖民統治者話語的權威性，使之不安。」（生安鋒，2005：134-135）對巴巴來說，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要比薩伊德來得複雜、細緻，而且對於「東方」造成擾動的周旋策略是薩伊德忽略、沒有顧及之處。

最後，《東方主義》忽略到「第三世界婦女」遭受雙重殖民化的壓迫。雖然，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認知到東方主義本身全然是個男性領域：和現代許多專業一樣，以性別歧視的眼罩來看待自身及其主題。這在旅行家與小說家的著作裡格外明顯，例如：女人通常是男性權力的幻想產物。她們展現了無限的肉感，或多或少是愚蠢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她們是心甘情願地投懷送抱。（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307）。薩伊德將東方主義中西方對東方是陰性化；西方男性往往透過文本及歷史物質的作為，進行對東方女性的剝削。但是，薩伊德卻忽略到「第三世界婦女」畢竟是與西方女性主義處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兩者存有物質與歷史上的差異，不能等同視之。在加上「種族」上的歧視及區隔下，「第三世界婦女」實際上是遭受著一種「雙重殖民化」的敘述（羅鋼、劉象愚編，1999：415-432）。

（三）殖民宰制：戲擬與混雜性的文化（再）生產

上述，我先是通過對後殖民主義的意義、源流與概念的釐清，而後銜接後殖民主義的重要著作《東方主義》，將東方主義的批評與論述作了一番探討。「東方主義」不但是一套西方支配東方綿密的思維，還是一種歷史時間軸線和非歷史時空的霸權意識。薩伊德以為，自古以來，在西方眼中的東方便是一個「充滿浪漫、異國情調、難以忘懷的記憶和場景，令人驚艷的地方。」（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1）同時，「東方並非只是一種想像性的東方。東方是歐洲物質文明與文化的整體一部分，所以東方主義就是在文化、意識形態層面，將這一部分表現與再現為一種論述模式；論述模式受到制度、詞彙、學術、意象、教義乃至於殖民的階層體制與殖民風格等等支持。」（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1-2）。於是有關一切「再現」（representation）的異類經驗，均收編在東方主義的體系之中。然而，如此單向度、無可遁逃的「總體化框框」（totalizing schemas），此觀點也引來諸多質疑。

著名的後殖民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即修正了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所以為的「西方往往將東方視為一個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以確立西方自身的主體並區隔彼此。」（Said 著，王淑燕等譯，1999：2）巴巴主張，因著殖民者在確立自身主體與被殖民者始終有所差別之下，殖民者從沒有意識要與被殖民者教化成一模一樣的複製品，畢竟那太具威脅性。然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卻仍必須固著、交織在這種同時吸引卻又排拒的矛盾關係中，形成一個互為依賴的卻不穩定的狀態。這使得被西方中心往往視為邊緣、被壓迫或隱沒的地帶，得以透過將中心建構為一種不確定、模擬兩可的矛盾狀態，對殖民主義話語進行回應（Young, Robert J. C., 1995：161）。換言之，這使得全球性不平等的階級、性別、種族，以至於被排擠、遺忘、扭曲等隱而不顯，存於後殖民帝國宰制“事實”底下，充滿多向度的殖民與被殖民矛盾狀態，有意義的消解了殖民者的權威，並且獲得應有的殖民發言位置。然而，巴巴為了更有效的指涉此種矛盾狀態，以有助於被殖民者反抗及顛覆的可能，進一步的提出「戲擬」、「混雜性」等概念。

1. 殖民戲擬：一種面對矛盾態度的策略

「戲擬」（mimicry）⁷作為後殖民批評的關鍵術語，是有意思且重要的顛覆性話語。在此之前，拉岡將「戲擬」視為一種“變色龍機制”，昆蟲為了因應大自然空間環境的生存所需，透過轉化自己身體，藉以達到偽裝欺騙手法來攻擊敵人或獵食動物，這是它在生物界中倖存的策略（廖炳惠，2003：165-166）。巴巴挪

⁷ “mimicry”英文一詞，中文翻譯有多種譯法，如戲擬、戲謔、戲仿、模仿、翻易、番易、擬仿，在本文中通稱為「戲擬」。

用拉岡的戲擬概念，提出「殖民戲擬」(colonial mimicry)的理論。他在《文化定位》一書中說明了「戲擬」此種“似是而非”的意義，他指稱「殖民戲擬就是對一個變了形的但可辨認的他者的欲望，他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個差異的主體……這種欲望，通過複製部分的存在……表達了文化、種族與歷史差異所引起的騷亂，這些差異威脅著殖民權威的自戀傾向。」(Bhabha, 1994: 86-90; 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 289)簡言之，「戲擬」那種近乎相同但是始終不一樣的特性，正是前述所指，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的矛盾樣態之中，轉化為一種介入的能動抵抗策略。

殖民者往往透過「戲擬」策略，施行著一種帝國殖民控制形式。因著戲擬“有像又不太像的模糊特質”，使得「戲擬」構成殖民權力與知識“最難以掌控”但卻又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事實上，殖民者使用「戲擬」策略最終目的，無非是持續地維持其帝國霸權，但是卻無可避免的伴隨著確保足夠的差異性，使之維持有效的殖民主體位置，變得永遠都獲得無法完全宰制成功。因此，我們可以說，殖民話語的「戲擬」策略是帶有多層且矛盾的結構，一方面以殖民者的優越權威，對被殖民之進行所謂的現代、文明、進步之改造；一方面卻又對殖民主體被殖民客體存在的差異與劣等的概念改進，進行嚴加的區隔及劃分(Bhabha, 1994: 86)。殖民者的「戲擬」策略即是在要求殖民主體與被殖民客體之間的差異與區隔，以便達到殖民者一方持續性的宰制與壓迫，然而諷刺的是，殖民者所堅持“文化差異”必然會攪亂、挑戰西方文化假設的普世價值。而被殖民者的能動性，正是「戲擬」的話語總是圍繞著此種矛盾狀態所建構而來，為了達到有效性，戲擬不斷產生滑脫、過剩及差異(Homi Bhabha, 1994: 86-92)。因此，戲擬在巴巴詮釋下，變成一種對殖民的規訓權威，隨時可能發生策動的殖民內在威脅。這種威脅是深具顛覆性、嘲諷性與內爆反動的效力。

2. 混雜性與協商空間

文化的「混雜性」(hybridity)是後殖民主義中，反文化霸權的一項重要策略。巴巴認為，我們無法單純地想像東方／西方、殖民者／被殖民、中心／邊緣、壓迫者／被壓迫者等彼此對立的關係，畢竟殖民與殖民之後中間的變動過程中存有複雜的戲劇與謎般的性質，它的互動關係並非像薩伊德東西對峙所能描述的。

巴巴在詮釋殖民與被殖民關係之間混雜的狀態，有意思地借助巴赫丁(Bakhtin, Mikhail)以「多聲」(polyphony)的概念，詮釋文藝復興時期之後各種方言互相混雜，而產生出跨身體疆界的全新主體，並挪移、轉化到後殖民研究之中，以「混雜性」(hybridity)重新解釋殖民與後殖民情境彼此亦有交織、文化含混的情形發生。而在矛盾難解的過程中，模擬兩可的「第三空間」成為語言

認同與心理機制新的協商機制（廖炳惠，2003：133）。

在巴巴的詮釋下，混雜性協商機制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可能性生成，是由於巴巴察覺到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殖民定型”與“二元對立”潛藏著複雜的矛盾性與衝突性使然。在巴巴看來，殖民者倚重固著的「刻版」來維持“殖民凝視（殖民規訓）”的穩定性。然而，殖民者卻又焦慮的感到「刻版」不是如此安穩、隨時可能有鬆動的可能，因此必須「重複」、持續的重新確認那「已知」的事情。由此可見，「已知」的事情並非如此牢固，它是存有空隙的。在巴巴看來，此種空隙反應出殖民者的心理有所「缺乏」，這種「缺乏」來自於殖民者倚賴刻版的結果，使得殖民者必須表明“他（殖民者）不是什麼來表達自己的（殖民者）身分”，然而矛盾與衝突效應卻在此間發生了。因為此間（殖民者）建構自身的身分過程，是必須隱含著對於“被殖民”或“對抗性他者”的不斷指涉才得以表明其殖民主體，但在與他者「協商」的過程中，也必然在兩者相互依賴、交織的關聯，潛藏著破壞自身的主體身分。巴巴進一步將此「殖民刻版」的功能，衍生到佛洛伊德所說的「戀物」對「戀物癖」扮演的角色，來說明這一種換喻結構的影響。巴巴認為，刻版就如同「戀物」般，取代了「現實」的對象，使得殖民者的殖民凝視往往投射出既熟悉的殖民刻版定型；但又陌生的維持一定差異性，使之不是如此相似（Bhabha，1994：74）。矛盾的雙重性促使既殖民幻想是如此熟悉又陌生、對被殖民者是既鄙視又潛隱著差性性誘惑。這讓後殖民話語並非如此單一刻版、二極對立，而是賦有混雜、矛盾的狀態。這種混雜性使得殖民意識形態處處產生裂痕、空隙，使得巴巴認為被殖民者有機可乘（生安鋒，2005：145-146）。

在巴巴看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的混雜性，克服了既有的二元對立，打開了一個「協商」的空間。巴巴形容，「這是一個雜交性場所，建構一個“非此非彼”的新的政治對象。...把政治行動與政治理解設想是一種空間開放...避免過早得出某種社會的對立統一或矛盾統一。」因此，「巴巴不以“否定”而改以“協商”，意在表達一種“暫時性”，這樣才可能表達對抗或矛盾的成分。」他同時提到：「我講“協商”，是爲了讓人注意到政治運動中的“反複申述”（反複確認）結構，這樣的政治運動力圖表達對力和對抗因素，但不會以揚棄和超越進行補償。」（羅鋼、劉象愚編，1999：187）巴巴不僅使用「協商」一詞來詮釋雜交的後果產生混雜化，進而瓦解了殖民權威（因為殖民者在反複確認的過程中，其實是存在差異性的，而非靜態、統一的刻版認知），巴巴更提出「第三空間」一詞，進一步說明只是強調對立、對抗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是存有很大問題的。巴巴所謂的「第三空間」，即是殖民與被殖民雙方在持續的交流、協商、翻譯的中介空間（Bhabha，1994：4-6）。在他看來，「第三空間」的中介使得意義和指涉結構成爲一種矛盾過程，因為它摧毀了習慣上將文化知識視爲統一的、開放的、擴展的再現方式，這使得我們曾經將文化看作一種殖民進行同質化和統一的力量產生了逆轉。換言之，巴巴把「第三空間」的存在，視爲確保文化的意義與象徵沒有單一、固定的

型態，它是文化差異傳佈的話語條件，因此才有可能排除那種兩極對立的政治。

巴巴的理論，使得“雜交的時刻”，被殖民者所重寫的東西並不是對殖民主義原有的拷貝、複製，而是性質上不同的一個物質體（羅鋼、劉象愚編，1999：236）。因著多元文化的交混雜糅，不但使得異文化之間有彼此交織與交錯的可能，在這種跨疆界文化的能量釋放過程中，許多新的意義也因此產生。巴巴利用這個方式，轉換成語言和文化的混雜情境，從殖民化與的內部進行解構，進而主張通過「協商」、「第三空間」開放所，以及戲擬、學舌和雜糅文化的抗拒想像，使之帶有「雜質」、變得「不純」，最終對殖民主義霸權的批判和顛覆即可實現（廖炳惠，2003：133-134）。

（四）小結

「後殖民主義」有意思的試圖從文化批判角度對殖民與被殖民作出解釋，或對知識層面上帝國主義以其霸權支配著科學的標準和認知歷史的方式作深刻的批判。對薩伊德而言，西方長久以來主宰東方的力量，無非是透過一套西方人所創造出來的「東方主義」論述。這套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的話語系統，所代表的是西方優於東方、西方更左右著東方、西方以有色的眼光來觀看東方，更無處不替東方（她）說、替（她）再現。

薩伊德提出的「東方主義」論述，以東／西二元對立邏輯論述，有力的指涉長期以來西方支配著東方的問題。不過，「東方主義」並非如薩伊德所指涉的如此穩固、無法動搖。於此，巴巴強調殖民與被殖民的東／西對峙，並不完全是簡單的緊張對峙關係，其實內存彼此之間既吸引又排拒的矛盾樣態。因此，巴巴提出「戲擬」、「混雜性」的周旋策略，試圖為殖將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的複雜、矛盾關係找尋協商的可能。

簡要來說，巴巴視「戲擬」作為一種後殖民策略，其實是帶有“似是而非”的模糊特質，一方面是帝國殖民最難以掌控卻又是最佳的殖民手段；另一方面的在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無可避保持差異性，避免被殖民逾越殖民者之時，讓被殖民者有機可趁，「戲擬」反而成了隨時可能發動、攪亂殖民內在的威脅。除此之外，巴巴更以「混雜性」來破除對東方／西方、殖民／被殖民、中心／邊緣的對立關係。巴巴視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關係比起法農與薩伊德暗示的更複雜，他強調殖民關係的結構來自「多重而矛盾的信念形式」（Bhabha，1994）。巴巴認為殖民關係中彼此矛盾的心理情感模式（例如對他者的慾望與恐懼）是流動循環、不穩定的，而非僅止於法農與薩伊德以為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各自認同與位置是穩定且

單一，之間仍有許多層次的殖民關係是彼此矛盾、焦慮、混雜的心理模式，且非靜態，而是充滿能動性與移轉性（Moore-Gilbert, Bart 著，彭淮棟譯，2004：207）。巴巴試圖以混雜性而非二元對立，打開一個“非此非彼”的「協商」空間。巴巴將此“暫時性”的協商機制的發生視爲：殖民者必須不斷確認自身不是什麼的反覆重申的狀況下，以區隔及確認殖民與被殖民的身分差異。於是，在殖民者凝視下產生了既陌生又熟悉的矛盾狀態。致使混雜性滲入其中使之變質，讓殖民主體產生鬆動、斷裂和空隙，於是被殖民有機可乘。

不過，巴巴的「戲擬」或「混雜性」概念，也並非毫無問題。首先巴巴有意思的視殖民權力並非殖民者所獨有，殖民話語的矛盾狀態性，構築了被殖民者在空隙中以戲擬作爲抵抗的策略。不過，此種“矛盾狀態”何時出現？何時才被啓動？巴巴似乎對此也產生猶疑未解。其次，在何種歷史情境中，戲擬能對殖民霸權產生具顛覆性的在展現其抵抗的效力，亦或者是僅限於特殊的歷史情境？巴巴似乎也未有清楚的說明（Young, Robert J. C.，1990：151-153）。

再者，巴巴所提出的文化「混雜性」抵抗、攪擾概念，也似乎太過樂觀。巴巴忽略了在雜交的過程中，往往掩蓋了東／西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關係，致使在全球化市場下文化含混遮掩了背後潛藏的文化帝國霸權操弄。因此，在討論混雜性作爲文化抵抗策略的同時，有必要釐清：“誰”在雜交“誰”？雜交的“主體是誰”？“誰有權”雜交？被殖民者是否如此「有意識」的作有效的文化抵抗？若放在文化全球脈絡上檢視，西方帝國倚仗其政治經濟軍事的優勢文化，是否在多重不平等關係中，以雜交之名合理化殖民侵略之實。倘若當今跨國資本的全球流動使得文化含混的雜種身分呈現模糊難辨的情況，而無法直接指涉殖民者與被殖民爲何，那麼各雜種組合是否依舊爲某種特定資產階級掌控呢？同時，後殖民主義所關注的弱勢、他者、邊緣、少數族群，是否透過雜交即可對主流文化霸權的入侵作有效的抵抗？亦或隨著文化含混性，滲入雜質、不純的情境下，沖垮、隱匿了其在混雜狀態發聲的可能？

這些問題，在「全球化」一些新的理論探討中，將追溯到政治、經濟與權力糾結的根源，正可提供「後殖民主義」在文化、精神與權力轉譯及相互滲透上，更爲完整、有力的詮釋。這也是在進入上海殖民都會與電影院研究前，本文先要對「全球化」理論與「後殖民」相關概念提出探討的用意。

二、 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批評

上一章回溯了「後殖民的意義」與「後殖民批評與文化策略」的相關觀點與其缺失。本章將接續後殖民的概念，嘗試從「全球化」到「全球城市」角度切入，以勾勒出（後）殖民城市的全球／在地思考，於後更完整聯結全球化與後殖民相關概念的分析，俾使整體理論探討與概念釐清更加完整。

（一）全球化理論批評

1. 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在各研究領域廣受矚目。至今，我們對它的定義與現象，仍處於高度的辯論狀態。90年代「全球化」更在各領域脈動中成為重要概念。有不少學者認為，「現代化」是促使世界走向一體化的過程（楊雪冬，2003：24-25）。這一種西方歷史文明的現代化進程，使得「全球化」被視為西方文化擴散、資本主義擴張、歐美文化的散佈、殖民化以及文化模仿的後果。這也迫使我們注意到，西方帝國和帝國主義脈絡的殖民語境裡，帝國的文化與擴張與全球化有所牽連。

近二十年來，「全球化」所涉及議題更加廣泛，不同的學者因著不同的背景與關切點，對於「全球化」意義界定、議題的探討也有種種思考、辯論，當中更不乏極端樂觀或悲觀的二極論點。不過，一般說來，「全球化」界定大概可以區分為五種，分別是：國際化、自由化、世界化、現代化或西化、非地域化。阿特·斯圖爾特（Scholie, Jan Aart）在《解析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書中，指出這五個基本的全球化定義在某些方面是有關係，而且某種程度上有所重疊，只是側重角度不同。例如：若將全球化定義為國際化的人與把它定義為非地域化者必然會對國際事務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於此，論者認為，定義在不可調和下致使許多全球化的爭論在起點上即陷入了僵局（Scholie, Jan Aart 著，王艷莉譯，2003）。因此，「全球化」的意義，可視為是一個多向度的過程，它同時是統一和多樣並存的過程，並且全球化存有一個不平衡發展的關係。此現象分別表現在經濟、文化及政治上。

在經濟上，「全球化」改變了經濟活動的本質。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有助於對當今全球經濟運作與全球空間的重要特徵有一釐清。哈維認為，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生產技術、消費與政治經濟實踐不斷的加快，傳播科技、跨國公司、交通運輸等不斷革新，更使得空間距離縮多了。跨國企業為了有效的因應全球各地方的消費市場需求與

各地勞動市場的供應，以便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以及提早佔據市場，確保其在全球市場競爭優勢與主導位置。此種全球性跨國資本運作過程，使得跨國企業的活動範圍已跨越邊界與國家界限，各種形式的全球流動加大了人類想像空間的擴大，形成一個跨國資本流動的複雜體系（Harvey, David, 1989：132）。

因著「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面擴張，帶來經濟時空相互滲透、斷裂衝擊，使得彼此之間界線變得模糊起來。於是有論者指稱，這種「不斷擴張的全球關係」與「資本主義的消弱的關係」聯繫在一起，促使我們走入了「晚期資本主義」。資本不再由「國家」為單位掌控，而是透過「跨國公司」的形式，在全球市場中作一種全球性串連與投資（Jameson, F., 1991）。然而，持反對意見者則強調，全球化使得經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延續性”才是主要特徵，因為全球經濟中心依舊處於中心位置，資本主義在全球化下仍具有延續性（Magdoff, 1992；Amin, 1996；McChesney et al., 1998）。因此，一般承認，在經濟全球化下，使得全球性結構作了調整、變化，導致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區域主義的興起、生產向跨國集團集中的轉變。跨國資本時代非中心或多中心化的結果，造成了全球產物的交混、混淆，這也讓後殖民批評變得難以單一指涉西方一方如此簡化。正如，德里克指出全球化後殖民語境普遍現象是：「跨國公司在盡力地讓自己的運作“非領地化”，但在其中新和分支機構方面，還有一個國籍認同的問題。一方面跨國主義是資本的一個新理想，另一方面，卻仍有美國公司、日本公司、英國公司等等。那怕是最“懸空”的經濟活動、金融交易，具有一個強大的銀行體制的英國仍可以對它的生產地域或者政權地位發揮超常的全球影響。」（Dirlik, Arif 著、王寧等譯 2004，118）所以我們在全球時代作殖民批評時，必須同時審視“非領地化”的剝削形式是如何利用政治、經濟交織而成的。

反映在文化上，經濟全球化促使了第三世界及前殖民國家也進入了全球化下跨國資本的流動體系，使得其有機會一躍成為世界經濟中新興的已開發國家之列（Dirlik, Arif, 1997：31）。不過，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國家或前殖民國家，事實上也同時面臨著遭致文化帝國主義宰制的危險。因著在各種跨國越界的市場活動中，跨國企業表面上看來似乎已不再需要有一個總部，它可以藉著各地代理人模式，以多中心、多邊的方式進行各地的全球資本主義操作。然而在此全球性跨國行為下卻也隱含著彼此相互滲透，隱匿且模糊了背後帝國主義的經濟霸權主導作用（王寧，2003：197）。明顯的日常生活作用顯現在對「全球性」（超地域性意義上的）描繪本質上地域空間的情境。如可口可樂、好萊塢電影等現象，觸及了地域位置，但他們同時也能過同時擴展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並透過即時聯結任何不同地方。文化全球化的結果，導致不少文化研究者擔憂，將會使得世界變得更為相似、文化更為同質。史密斯（Anthony D. Smith, 1996：174）更進一步接合「國家民族」的概念強調，我們正目睹一場從族群或國家的文化帝國主義，轉變到一個以道地國際都會科技下層結構為基礎的「超國家」（supranational）形

式。超國家文化「終將削弱文化之間的差異性，產生真正的全球文化。」在這個脈絡下，「全球文化」被描述成一種「兼容並蓄的、普遍、永恆而重視科技的文化」。換言之，全球文化的普遍性宣稱，其實是掌握在擁有權力的強者建構而成。

在政治上，全球化導致世界政治脫離了以國家為中心與主權為基礎的治理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多邊跨國公司的興起與全球城市的重要性增加（Sassen, S, 1997）。不過，也有其他學者宣稱，全球化的發展並沒有削弱國家主權的地位，國家在全球資本流動依舊具有管理全球經濟活動的基本能力。事實上，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國際金融市場，國家仍扮演主要的管理力量（Kapstein, E.B., 1994）。然而，不可否認的，全球化的過程確實使國家形式和職能發生了變化與調整。柯司特將此全球化現象，視為“網絡社會”的形成。在這個社會中一個新的“流動空間”與舊有的“地域空間”並存在一起（Castells, Manual 著、夏鑄九譯，2000）。面對著全球的“超地域情境”的到來，全球空間的擴展推動了資本主義組織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前述所提的跨國企業或海外金融中心、企業兼併、壟斷的興起；更因全球資本主義流動，擴展到消費、金融、信息、通訊等領域，其結果造成全球化將從根本上加強了資本主義在當代歷史上支配性生產結構的地位，「國家—民族」地域疆域也將面臨崩解，促使全球文化也面臨著斷裂的文化認同危機現象產生（Cable, V., 1995）。

綜合上述可知，全球化其涉及範圍與定義雖十分廣泛、爭議紛雜，不過大致上可以將全球化定義與現象視為，“全球各個地方更緊密地形成一個整體，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交互影響程度也愈形明顯，同時充滿著權力關係矛盾的動態過程”（魏均，2004：68）。在此一過程中，隨著跨國資本的發展，文化也將進入跨國化過程，形成所謂的全球文化。換句話說，跨國資本主義將使各種文化更加接近，通過傳媒互相交流、滲透、融合，改變各種傳統文化原有的特點（王寧、薛曉源編，1998：93）。全球文化造成的影響，不僅擴大了某些個人認同的混雜，並且也包含著同質文化空間的可能，對各地的文化造成莫大衝擊。然而，無論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混雜或文化同質的過程，勢必隱含著強勢者主導並且掌握文化商品與跨國文化形式的生產，使得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情景，最終只是一種強者對弱者的宰制形塑模式。此外，隨著全球化對地方性與社會、經濟、政治空間之間關係的重新定位，跨越區域的資本流動的影響，將直接挑戰支撐現代國家的地方性邊界問題，甚至打破國家所預設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直接統一性與控制性。事實上，在全球化下空間型態的重新分配與改造，已對地理進行巨大的重新建構，「全球城市」發展的興起即是重要現象之一，它已成了「國家」之外，理解全球化背景下新型態空間組織的重要概念，也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內容所在。

2. 全球化與上海城市

近年國內討論全球化對於上海城市與區域空間發展的相關議題不少，大致可劃分成二種主要的研究策略：一種主要以上海的都市計畫與區域發展作分析，對於土地、勞動、資本的運作方式也有一個整體的研究（王鴻楷，1996；華昌宜：1997；夏鑄九，1998；王振寰，1999；王佳煌，2001；王振寰，2001；王振寰、黃書緯，2001；簡搏秀、周志龍，2002；黃宗儀，2004）。另一種則以城市空間生產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試圖提供另一條理解上海城市文化議題置於全球城市發展的思考方式。近期相關的研究如：施長安的博士論文《全球化與上海-浦東的後殖民發展》（2004）以結合「後殖民論述」作「上海-浦東」的全球城市發展策略分析；黃宗儀則選擇以上海作為跨城市連結，利用城市鏡像的「對位」思考提供城市文化與城市空間生產另一種可能，例如〈全球都會區域連結的跨國身份想像：以上海與台北為例〉（2005）、〈跨國空間與城市連結：全球化情境下的香港上海雙城記〉（2004）。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學者包亞明在《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包亞明，2001）亦透過全球城市語境以茲上海酒吧空間特性更完整的全球／在地分析；近期包亞明更計畫從全球化都市研究的角度關注文化與權力的關係，以及城市文化和日常生活空間的演變過程和影響，以「上海“新天地”與新都市空間的意義」為研究個案。由此一研究發展軌跡可見，無論是從“城市-區域”分析的全球互動著手，或（如本文）結合“文化研究”來分析城市的空間生產，焦點或多或少必須將「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納入研究思考或討論。主要原因無非是研究者均注意到，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全球化現象已造成全球各地更加緊密的形成一個整體。隨著“國家－民族”地理疆域的崩解，大部分的資金與資源集中在一些全球主要城市，在交互影響、即時連結愈形明顯的結果，全球化造就了新型態城市的出現，上海城市亦是此發展過程中重要成員之一。

「全球城市」作為一個全球化重要的議題，此一研究態勢自 80 年代末空間轉向漸趨明朗化。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下，城市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愈形重要有關。隨著 90 年代開始，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與全球市場的供需關係，產生了資金與資源的分配不平衡、不平等的狀態，促使金融、服務、通訊、交通、人口等集中化，使得如紐約、東京、倫敦、巴黎等城市在空間聚集及高度密集發展情況下，形成一個有別於傳統國際城市的階級－即所謂的「全球城市」的新概念（Hall，1966；Jameson, F.，1986；Sassen，1991）。經濟地理學家薩森（Sassen）在《全球城市：紐約、倫敦和東京》一書中，闡明「全球城市」重要基本概念，視為此類相關研究重要前導。書中指出，在經濟全球化下，位於全球中心樞紐的城市，透過了跨國資本運作、資源重新分配的結果，遂而改變了新的中心與邊緣形貌關係。同時，全球城市也肩負起扮演城市連結與都市區域發展的功能，以及與地方社會、經濟依賴的指導性角色（Sassen S.，1994a）。換言之，「世界經

濟的關鍵結構必然落在城市...而城市的地位被其世界分工中的位置以及整合到當今全球化過程所塑造」(Sassen S., 1991: 4)。因此,「全球城市」不但具有全球控制的功能,它也具有主要地緣政治的特質(King, A.D., 1990: 26)。之後,薩森更在《全球網絡,連結城市》一書,進一步將「全球城市」放置在全球網絡關係中作思考。她主張,不但要正視政治、經濟、文化在全球城市巨集、重合的空間生產重要性,同時,不可忽略墨西哥、聖保羅、布宜諾艾利斯、上海等第二級城市在全球網絡中也有其特殊的運作模式(Sassen S., 2002: 9-14)。

雖然,薩森將上海視為邁向全球城市發展中的第二階層城市,尚未成為第一階層的全球城市,不過薩森卻點醒了我們在思考上海城市或上海特定空間時,全球空間與在地空間之間互動關係與跨界流動重構問題的重要性。亦即,上海在邁向全球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是交織在全球資本流動與全球城市緊密連結下作發展;透過持續不斷的在全球/地方作跨界的物質與文化流動交疊影響下,突破了對國家區域地理疆界的政治想像,形塑出一個全球/在地的跨文化的流動空間。其表現在當代個人與城市的關係,誠如《全球網絡中的都會區域與城市》一文所指,「二十一世紀的城市形構與重構可以說是全球網絡裡流動空間的節點之表現。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命運是在都市地區完成演出,特別是在大都會中,即,全球城際網絡中的都會區域。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夏鑄九、劉昭吟, 2003)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柯斯特(Castells, Manuel)在《網絡社會的崛起》巨作中將上海城市的空間形式視為「鉅型城市」的新型態空間論述。柯斯特將「鉅型城市」定義是全球經濟的節點,集中了全世界的指揮、生產與管理上層的功能;媒體的控制、真實的政治權力、創造和散佈訊息的象徵能力。然而,「鉅型城市」並非全都是全球經濟的支配中心,但它們確實有大量人口連結上全球系統,其腹地的磁石,吸引了其所有的整個國家或區域。柯斯特強調「鉅型城市」城市的考量不是只以規模來看待,需相對將世界主要區域的重力函數納入審視。柯斯特認為「鉅型城市」特殊之處,乃是外部連結到全球網絡和本國的某些部分;內部卻脫離了功能不必要,而社會上引起分裂的人口。這使得新都市形式特徵出現:一方面跨越了廣大領域而建立起功能性連結;一方面卻在土地使用模式上有明顯的不連續性,造成了鉅形城市的空間片斷、功能碎片和社會區隔的不連續群簇(Castells, Manuel 著、夏鑄九譯, 2000: 496-499)。反應在城市互動上,使得「鉅型城市」與國際之間關係是更加緊密,但國內城市之間的關係卻反而相形疏離,造成全球化過程中全球連結但與國內脫節、斷裂的特殊狀態。

綜合上文所提的「全球城市」與「鉅型城市」概念,其表現出的全球空間與在地空間思考,對“上海電影院空間”來說是深具意義性的。借鏡包亞明在《上海酒吧》一書中也相同將全球性與地域性納入“上海酒吧空間”理解的重要考量。他

指出，「上海酒吧的特徵是既具全球性又具地域性」。不過，「我們不應該忽略全球性與地域性問題在當代中國的某種內在緊張：地域性知識往往通過日常生活的權利來對抗資本與民族國家等抽象的要求。...上海酒吧通過消費革命化與的資本敘事，這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立場是有差異，甚至是牴觸的，但是上海酒吧所主張的消費主義的資本取向，卻又滿足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於全球化的文化想像。」（包亞明，2001：12-13）因此包亞明認為，在當代中國的特殊語境中，上海酒吧空間的生產體現出國家與城市發展之間雙重矛盾的使命，即一方面，上海酒吧的營造是在國家與資本通力運作下才得以生產，國家扮演著政策與資金的重要介入要角；另一方面國家，國家在推動城市空間發展之餘，卻需得顧及可能遭致跨國資本把持下，進而削弱民族國家與文化認同（包亞明，2001：13）。

反觀“上海電影院空間”的現象更是明顯。長久以來，中國對電影政策始終是高度介入，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加快，近十年來中國沿海城市在快速發展下有了重大改變，電影與電影院政策也面臨全球化衝擊下鬆綁的命運。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大量的文化商品首先隨著全球化背景下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沿海主要城市，使得如電影院空間充斥著跨國文化的商品，電影院空間不僅成為西方帝國文化產品的窗口（特別是好萊塢的電影週邊商品），更在此空間高度承載著文化同質的可能。然而，中國為了避免被外來徹底的文化滲透，國家於此也在政策與資金上作大量的介入。在國家背負著邁向國際發展又擔心因此削弱民族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危險之下，使得如何在「全球城市」或「鉅型城市」語境中理解上海電影院空間特性（國家－城市之間的運作及拉扯），成了理解上海電影院空間形構與文化想像塑造的重要課題。

（二）全球化下後殖民語境的概念分析

1. 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

前述已分別對「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的相關看法及意義分別提出說明。然而，「全球化理論」與「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為何？之間又有何區別？是本節要更進一步探討的重點。承接前述論點，本文發現，後殖民性對文化批判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特別是自《東方主義》（1978）一書問世以來，將後殖民理論從西方學界的邊緣引入中心，激起各種問題的討論。同 80 年代期間，全球化在全球資本主義助長下，使得「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之間存有緊密對應關係，在 90 年代這兩大論述更成為文化研究與英語世界的顯學。

首先，後殖民主義在全球化觀點上。如前文〈全球化〉闡述，在現代化西方歷史進程角度出發，一般認為「全球化」首先是出現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和金融的現象。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因素使得近代西歐得以佔有優勢，西方文化變得更容易擴散開來，資本主義的轉換使得歐洲文化獲得更大的擴充空間，帝國殖民化與文化含混更加大了西方世界在商業及文化等形式的全面擴展（楊雪冬，2003：5-6）。這讓大多數的文化研究論者，在討論「全球化」時，以經濟貿易與消費為主軸，用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或後殖民主義等修正過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觀，來探討全球化下的新秩序。更以文化批判論述，將“西化”或“現代化”乃至於“美國化”的論述方式等同類比為「全球化」，以詮釋在全球化歷史進程中，西方憑藉其現代性的社會基礎，不斷透過複製「西方／非西方」、「中心／邊緣」、「第一世界／非第一世界」等框架來鞏固其世界中心位置（Tayler, P.J., 2000；廖炳惠，2003：126）。這使得非西方國家或地區在此一過程中，面臨「傳統文化的摧毀」及「全球同質化」的問題。

最終，文化全球化的後果就是把美國的價值標準強加於世界其他民族，迫使不同的文化趨同、標準化的傾向（王寧，2003：197）。瓦斯特（Malcolm Waters）即指出：「全球化是一種社會與文化正逐漸擺脫地理限制而趨於同質化運作過程，在此範圍下，人們的共同意識正逐漸退化。」（Malcom Waters，1995：1）霍爾（Hall）也說：「在全球文化的衝擊下，由於國家與時空之間的隔閡已經脫位，因此全球正經歷者一種共享的認同情境，並且文化同質性正瀰漫著。」（Stuart Hall，1996：63）可見，全球化其實是以國際強權與跨國企業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處於強勢，因而造成“文化同質”的危險，隱含著文化帝國霸權的後殖民樣態。

相對的也有人認為，全球化的發展是包容著“文化多樣性”而非趨同（Appadurai, A., 1990；Cable, V., 1994）。持此觀點者強調，全球化市場及通

訊將視各種地區環境、特點，採取不同的形式，而造成不同的影響與作用。另外更有人持「混雜性」的新式意義在文化認同與社會群體中出現。此一觀點認為，全球化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並且也將民族與文化間的區別變得“模糊”，使得全球化與語言混合及混雜聯繫在一起，這些文化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群體形式，使得往往我們習慣以二元對立指涉彼此的關係，產生了第三種新式混雜文化組合（Hannerz, U., 1987）。

其次，在論及全球化對後殖民主義的重要性。主要有兩點：第一、全球化是對世界權力關係結構的一種展示，它在二十世紀裡堅定地維持著西方帝國主義的遺產和延續。第二、地方性社區對付全球化的方式，與歷史上殖民地社會對付挪用帝國主義主宰控制力量有相似之處（生安鋒，2005：28）。二十世紀之後，隨著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傳播科技也同時扮演著文化全球化以及經濟與政治活動進行的重要基礎。麥克魯漢（McLuhan, Marshal）更在六〇年將此全球化現象，譬喻為「地球村」，以說明新出現的電子互賴關係，會將世界改造成地球村的樣子（Levinson, Paul 著，宋偉航譯，1999：127）。然而，此種四海一家、烏托邦式的樂觀理念，背後卻隱含著一種複雜的全球互動權力體系。馬派的傳播史學家許勒（Herbert Schiller）即指出，主流的「全球化」理論過於樂觀，忽略了國際強權持續利用軍事行動掌控國際政治局勢，以及文化帝國主義的種種宰制活動（Schiller, H.I., 1991）。許勒強調，二次戰後的帝國主義擴張，不在是以「國家」為行動單位，而是「跨國企業」。透過母國的協助，跨國企業的商業力量滲透發展落後國家或前殖民國家，並且大量輸入資本、商品、科技、高階經理人、商業模式，影響層面更廣泛擴及消費至上主義，外來的舶來品影視節目所傳遞的內容，反讓西方強權藉由意識型態與文化價值觀鞏固了以西方為中心的社會體系價值（劉世鼎，2000：30-31）。因此，全球主義就如同帝國主義一樣，是多邊、多向度、跨文化的文化滲透活動。

最後，在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的區別上。杜林在〈後殖民主義和全球化〉一文中指出，我們必須認清「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理論」兩者的區別，否則很容易掉入彼此的辨正關係之中難以脫困。杜林簡要的將此兩者作了一個區分。他認為「後殖民主義」是一種知識份子嘗試描述「殖民主義」關係結束後的時代努力，它試圖擺脫西方現代主義普世論，從“非現代”中挽救出來。「全球化理論」主要探討全球同步傳播技術和一體化，橫跨大陸的流動的影響，以及既非被歷史也非被地緣結合的共同體的行程，同時也更深入探究“世界經濟”對地方和民族經濟的勝利。總結而論，「後殖民主義」是為“非歷史化”，它作為關聯著過去和未來的“非現代”的主導敘事和恢復，是“進步目的論”時代的消逝；「全球化」則為“非地方化”理論，意味著“地域界限的隱退”，“客體和風格”的逐漸嬗變，它進入到一個支離破碎卻是一體化和能複製的本源。杜林認為，一旦一個人把全球化理解為正面而把殖民主義理解為反面，並認為全球化和殖民主義都被不同的慾望、

話語、目的和觀念所驅使，那麼，某種“歷史時刻”和“歷史概念”就突顯得尤為富於啟發性和意味深遠（王寧、薛曉源編，1998：141；147）。雖然，杜林為了便於指明清楚，而將「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理論」推向極端的看法存有不少疑慮，然而他突顯了兩者關切的重要差異，但兩者對於“歷史時刻”思考的重要性卻有相似之處。

美國左派歷史學家德里克（Dirlik, Arif）也強調“歷史時刻”關注的必要性。他以為，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不通過“歷史”便無法說清，更無法克服（胡大平，2002：79）。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此指稱的“歷史”意義並非依循歷史起點回顧全球化歷史，因為這個歷史每天都在我們眼前持續重演。從「全球化」來看，如同市場每一步的擴大，全球化使每兩個地方之間相互聯繫增強，每兩個互不相識的工人之間彼此建立再也分不開的關係，這一切都是因為市場而發生的，其背後不都深深打上資本的印記嗎？因此，真正的“歷史”應該是揭示過去曾經出現過的，而如今以新的方式發生作用，作為我們生活主要支配力量的東西（胡大平，2002：81）。更進一步來看，若將「全球化」視為某種霸權後果，德里克強調，全球化持樂觀者其實掩蓋了社會和經濟的實際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是過去留下來的東西，同時也是新的發展產物（Dirlik, Arif 著，王寧譯，1999：4）。反觀「後殖民主義」雖持“非歷史化”論點，以避免掉入歐洲中心主義的「總體框架」的敘述（陶東風，2000：191）。並不表示「後殖民主義」忽略了“歷史時刻”的重要。如同一開始對後殖民理論探討所提，「後殖民主義」往往被視為一種帶有鮮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對於後殖民主義“之後”的認知，應該將“之後”與“之前”（歷史延伸）密切聯繫來理解；所有的後殖民主義話語是鑿基“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事實以及這一現象所造成的後果”（羅鋼、劉象愚編，1999：2）。這也就說明了，全球化下的後殖民語境，無時無刻必須觀照到“歷史時刻”，才能真正揭示過去曾經出現過的，於今以新的方式發生作用的支配力量所在之處。

總結而論，後殖民主義側重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批評，有助於我們揭發根植於全球化下帝國主義修辭與意識形態的非領地文化殖民滲透。藉此打破以西方歐洲為中心的霸權論述，要求多樣選擇的歷史，以重新理解全球化對本土化的文化作用。因此，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是存在著一種緊密不斷的聯繫關係。此外，後殖民主義「透過借助全球性系統而挪用表述、組織和社會變化的策略，地方社群與邊緣利益團體既可以給自己增添力量，也可以藉以影響全球系統」（生安鋒，2005：28）。因此，全球化論述與後殖民主義互相提供新的意義與補自身不足，成了審視歷史時刻後殖民的力道所在。

2. 後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在政治、經濟、文化的重構的影響，「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發展也成了後殖民主義重要探討問題。然而，「民族國家」的意義為何？各種理論因為切入視角不同，解釋也有所差異。安德森提出「民族國家」是「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概念，可為此作一個整體面貌的勾勒。他認為，透過共同的想像，尤其是經由某種敘述、表演與再現方式，將日常事件透過資本主義印刷技術、報刊雜誌、小說、記憶、官方語言、人口普查、博物館等象徵資本；國旗、國歌等共同儀式的形塑，建構出國家與公民的觀念，並且因此產生強烈的親密歸屬感與同胞愛，以便鞏固民族國家既有體制和促進民族國家發展的目的（Anderson, 1991）。之後，安德森更正視到全球化流動的移民與族裔帶來異質性鬆動的可能，於此他補充「想像社群」的概念，將日常生活中連貫與非連貫的連續性報導，也同時會形塑民族的共同想像（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廖炳惠，2003：139）。換言之，「想像社群」在不同面向中被延伸、擴充出去，進而造成個人對「民族國家」與「民族身分」產生固定疆界內與不定疆界外的新想像。這些影響對於當代全球化下「民族國家」起了基本的變化，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全球化的影響雖然未根本上削弱民族作為“集體團結”主要結構的地位，但是卻使民族與國家的聯繫出現了鬆動。這使得，在傳統民族國家以外，另外發展出許多種族民族、區域性民族和全球民族的多元概念。這也讓非地域性集結（如：階級、性別、種族、宗教）擴展開來（Jan Aart Scholte, 2003：191）。雖然如此，不過不可否認的，傳統以國家領土範圍發展出來的「民族國家」概念，仍舊保有一定的主導力量。廖炳惠即指出，「不論是透過文化、想像、交通或戰爭，這些理論基本上都認為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是文化社會建構的產物，雖然面對全球化的介入與跨國貿易體系的經濟威脅，但稅收、教育、族群糾紛、健保與國防等議題，依然視各民族國家內部都必須獨立面對的問題。因此全球化並無法完全吞噬民族國家的在地性。」（廖炳惠，2003：171）

其次，「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相互影響，使得文化含混著複雜、矛盾與衝突問題。「民族國家」在此，可以視為對「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接縫點：一方面透過國家組織可以進行聯盟觸擊世界；另一方面則結合民眾的歸屬與向心力，強調本土的特色（Featherson, Mike, 1996：32）。不過，也可能導致民族集體在追尋「本土化」的過程，落入極端認同或排斥的表達形式，致使陷入“抵抗資本入侵”，“減緩朝向進步與發展”的兩難；同時，亦有可能造成本土認同上，“種族衝突”的糾結。因此，法農與薩伊德雖承認，民族主義是最有效地聚集與表達，扮演著反殖民積極的作用，但他們同時也都傾向相信，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應當以徹底告別殖民邏輯與對抗意識形態，走向一個後民族主義的新世界為最終目的（陶東風，2000：141）。

最後，全球化致使民族國家產生「混雜認同」與「多重身分」的出現。「多重身分」雖在早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接觸之際就已出現，但是在當代全球化跨地域與跨文化流動快速、時空壓縮下，造成“每個人都同時代表幾個群體的後現代情況”發生（Jameson, F., 1991：322）。這使得民族主義轉向為不再只是維護舊有民族團結的話語，合作政治或協商政治取代了對抗政治。如〈混雜性與協商空間〉一章所提到的，殖民遭遇的兩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必然被一個交流、協商與轉譯的「第三空間」所中介。反殖民的工程就是運作、實施於這個未定的空間或「雜交性地帶」。一個新的、超越了非此即彼的政治客體／對象的建構上當地疏遠了我們的政治期待，改變了我們認識政治意義的方式（Bhabha, 1994：4-6；陶東風，2000：157）。因此，在全球化下，雜交性等所導致的文化變異與文化不穩定性促使民族身分的混雜，對民族國家的建構無疑也形成了重大的威脅。

綜合上述，我們認清在全球化時代條件下，民族國家的概念雖隨著超地域性的流動擴張而有所鬆動、消滅，但是其依舊扮演一定的主導力量。特別是在全球資本擴張與中國後殖民發展關係上，在全球化相互共構、交織情況下，我們無法忽視中國國家機制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影響力量。尤其在上海電影院面臨轉型以朝向全球城市發展基礎上，更往往是與國家電影管制基礎無法分開對待，國家對城市電影院發展實有一定方向性的主導權力。同時，在殖民過渡到後殖民的上海電影院發展過程上，我們不能忽視中國在民族性集結上扮演著後殖民抵抗或協商的功能。更直接的來說，中國在逐漸從社會主義轉型為開放資本市場化的過程，沿海試點城市勢必首當其衝，而國家為了有效抵抗大量的文化入侵，策動國家民族性大規模的集結觀影活動，並對外資、外片進行控管、調節，以便在城市電影院與電影政策鬆綁之際，扮演適時左右的影響力，此即為本文後續探討無法忽視之處。

3. 後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

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相關概念討論下來，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全球化或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亦或者兩者交織對照來看，都和「帝國主義」脫離不了關係。它們對第三世界或昔日被殖民者承載著長期歷史想像。全球化與後殖民暗藏著「帝國主義」連續、斷裂的關係，使得「去殖民」和「去帝國」對於全球化思考成了必要的雙刀劍。這個聯繫可在〈全球化是帝國主義的變種〉一文中主張，“全球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另一個名稱”更為簡明認知。在這個基調下，論者以為，全球化是包括我們所有的人，同時又排除我們其中任何一個人的責任：我們大家均是臣民。由於我們無法在當中指出任何一個中心、一個權威，因此我們無法驗證權力的出處，無法找尋出責任的歸咎或怨憤的起因。國家、公司因為跨國

公司不擁有總部、中心或邊緣，使得指涉上變得失去效力。在如此混雜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真的想尋找一個中心、一個代理人，它的名字不叫跨國公司，而叫美帝國主義（王寧、薛曉源編，1998：43-53）。這個主張或許過於簡化論之，忽略了之間存在地域、形式與根本意義上的差異，但是卻點明了「帝國主義」在任何“歷史時刻”均以各種方式出現，直接、間接作支配，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更是有利其抹去、模糊其帝國殖民的色彩，進而無需為殖民脫罪。

追溯早期「帝國主義」源起與意義，它往往是殖民者自持一份誇張的責任感：以「種族」概念是逃遁於一個無任何責任感、無任何人文事物存在的境地裡；而「官僚制度」卻是責任感帶來的結果，這種責任是任何個人不能為別人擔負，任何民族也無法為其他民族負擔。藉此來合理化「帝國主義」侵略型行為。在帝國的凝視下，海外民族是卑微的、全然無希望的，因此必須受到保護。同時，「帝國主義」更以「擴張」是一切政治的終極、永恆目標的核心觀念，無止境地拓展工業生產，這也顯示出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經濟貿易掠奪、剝削的特色（Arendt Hannah 著、蔡英文譯，1982：5；123-125）。因此，早期「帝國主義」是以歐洲民族國家為中心主體，自其民族疆界向外「擴張」。1905年英國學者霍布遜在《帝國主義》一書，則將「帝國主義」有較寬廣的界定為，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獲取港口腹地、利益範圍、勢力範圍、宗主權、保護權，常以武力佔有土地或領有地，有時用“租借地”、“租界”、“重劃疆界”之名（John A. Hobson，1998：13）。

近代，「帝國主義」更全面的在文化、政治、經濟進行徹底的支配，它深入著被殖民者的文化及意識。對此薩伊德提出「文化帝國主義」，強調支配性的都會中心，如何對遙遠的地區行使意識形態的宰制與監控；有別於「殖民主義」是以殖民者透過遠距控制，或是指派行政官僚定居殖民地，行使具體的統治。普遍也認為，「帝國主義」與政治、軍事、商業行為的統治關聯較為密切；「殖民主義」則是殖民者以說服、象徵和生活方式等制度介入，和被殖民者的文化間展開權力的斡旋與爭鬥，同時，「殖民主義」也特別強調「種族」的區分，也就是殖民主與被殖民者存在一種主奴關係，使得殖民者對劣等人種（被殖民者）在性別與階級產生幻想與刻板印象，並進行體制化支配（廖炳惠，2003：47；140）。

因此，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雖有其本質的差異，但它往往是同時存在，而且均是一種對被宰治的一方，進行剝削或佔有的活動。可見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始終存在緊密且重合的關係，使得我們難以清楚界定其主要不同特徵。可以說，「殖民主義幾乎永遠是帝國主義所產生的後果。」「在我們當今的時代，直接的殖民主義大都已經終止；而帝國主義，一如我們應該看見的，則始終在原地陰魂不散，以一種普遍的文化領域，或是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慣例存在。」（Said 著，蔡源林譯，2001：41-42）

（三）小結

上述我承續了後殖民主義的理論，處理了全球化下新殖民時空二大面向。首先在全球化的進程裡，可以清楚發現，因著殖民歷史與現代化同步的結果，使得西方往往自持文明、進步及優於東方的定見對東方進行宰制與論述。並且，在殖民地紛紛獨立，脫離殖民獲得政權上的獨立之後，因著政治經濟不平等結構下，原殖民地依然無法擺脫對原宗主國的依賴，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生活方面中被呈現出來。同時，在全球資本主義中，新技術的快速革新，不但造成了時空壓縮，也造成了全球化新殖民形式呈現出多中心、去國家的跨國、跨疆界更細緻的西方帝國宰制活動。在本文看來，從殖民到後殖民權力結構，即是需要一併放置在全球脈絡重新檢視。

因此，為了更完整的揭示全球化下殖民體系的駕馭系統為何，本文進一步將「全球城市」放置在全球網絡與後殖民語境關係中作思考，尤其對於後殖民城市而言，如何在新殖民時空，再度遭遇西方一種新的文化帝國主義宰控，必須被提出來。透過全球城市的分析與探討中可以發現，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或城市致力於全球化發展，以期能與國際緊密接軌，驅使自己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呈現出與全球連結但與國內脫節，產生斷裂的特殊狀態；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逼使「本地文化」面臨跨國性的文化滲透、交混，迫使國家面臨在致力於全球城市發展的同時，遭遇民族國家與文化認同削弱的問題。對於上海城市和電影院來說，中國如何又是如何看待上海在全球和在地的關係發展，這即是需要通過全球化與殖民的歷史時刻來看，其細緻的原因我將在第三章呈現出來。

然而，為了更進一步探究全球化和殖民之間的複雜關係。本文認為有必要對全球化下後殖民語境的相關概念作細部的分析及釐清。在全球化與後殖民兩者的比較裡，可以見到全球化本身隱含著文化帝國霸權的後殖民樣態，也包含著全球化多邊、多向度、跨文化的文化滲透活動。可以說，在全球性的跨國資本及文化運動，不能單純的視全球化為正面，而後殖民主義全然是負面的後果，它應是一種歷史與非歷史綿密交織而成的複雜語境。它不但需要通過殖民歷史淵源，才能解揭示殖民之後的延續為何。它也須顧及全球化的殖民宰制形式在不同殖民歷史脈絡中有何相似和迥異之處？並且，它還需從歷史現實和殖民幻想中抽取出殖民元素的構成。以便環顧殖民印記如何在全球／地域上被加以重構和再現出來。總結而論，我們在表示一種新的後殖民概念時，無法遺忘新殖民語境下動態和靜態的混雜樣態，其造成特定歷史時刻所產生的影響。

自然，在檢視中國的上海尤其引人注目的，尚包括後殖民主義在民族主義表現方式。顯然，在一種普遍認知的全球化的氣氛下，新殖民時空跨國資本的流動

不僅打破了地域疆界的隔離，也在急速變遷和多重滲透下，鬆動了民族國家的概念，牽動著在地文化被吞噬的可能，亦或經歷一番非領地化的新殖民歷史變遷。這一切在後殖民看來，透過「民族國家」有效的聚集向心力，有助於抵禦本土特色遭遇全面的帝國文化侵略，不過也可能在民族抵禦、拒斥過程中，滯後了國家或城市的發展。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反映在上海都會與電影院空間上，國家（政府）如何在城市發展和民族國家之間造成一種奇妙的張力，形成反殖民積極的作用或產生一種戲劇性既防堵又開放的手段，成了瞭解後殖民文化語境的上海必須同時顧及的一環。

另一方面，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探討中發現，兩者雖有本質或界定上的差異，卻存在一種緊密併行、重疊的關係。因此，若從一個歷史時間序列來看，帝國主義對於上海城市與電影院空間的宰制形式，也挾帶著殖民後果的生成，並且殖民的後果如何在斷裂、延續而過渡至今新的時空脈絡；同時在上海電影院上分裂或塑造出明顯可見的新／舊殖民文化的差異？國家與跨國資本又在此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在「重構」上海電影院時，需更精細的描繪出這種殖民與被殖民的複雜關係。